

文史知识

1986

5

先秦史研究的现状和展望

赵光贤

「风」「骚」传统对后世文学形式的影响

杨公骥

我国古代国家的形成

斯维至

八卦的「秘密」

曹础基

为什么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王玉哲

夏文化探讨的回顾与展望

孙英民



1986



WENSHI ZHISHI



医药学院610 2 01478597

文史知识

1986年第5期

(总第59期)

先秦专号(上)

• 治学之道 • 先秦史研究的现状和展望	赵光贤	3
• 文学史百题 • “风”、“骚”传统对后世文学形式的影响	杨公骥	11
• 历史百题 • 我国古代国家的形成	斯维至	19
• 怎样读 • 清代学者研究先秦史的丰硕成果	王树民	25
诗 文 欣 赏	《诗经》中的比兴(怎样欣赏古典诗词之二十四)	沈玉成 30
	向往人生自由的心声——读《庄子》外篇《马蹄》	李知文 35
	淡云轻雨拂高唐——说宋玉《高唐赋》、《神女赋》	徐公持 39
• 文史书目答问 •		
《甲骨文合集》与商史研究工作	胡厚宣	43
文化	八卦的“秘密”	曹础基 49
史	我国骑兵的诞生和发展	阎 铸 54
知识	古代宗庙制度浅说	张 庆 59
先秦时期的特殊外交语言——赋诗言志	靳 干	63
人物	诙谐风趣的哲人庄周	田居俭 65
春秋	齐国的名将田单	杨 钊 71
先秦青铜器中的酒器	任伊木	75
漫话先秦时代的衣食住行		
食——先秦时人们吃的是什么	杨 村	77
衣——周人的衣、裳、冠、履	高达云	78
住——先秦时代的房屋	宜 林	79
行——先秦时代的车	王效德	80

尧舜禹的治绩 晁南之 81

{ 民族 } 殷商居民的种族 韩康信 83
{ 与 } 漫话图腾崇拜 宋兆麟 88
{ 民俗 } “伯禹懋鯀”与产翁习俗 程德祺 91

• 文史信息 • 北京延庆古山戎墓葬的发掘(95)
黄老之学的形成与衰落(95)

• 古文字与古史研究 •

西周甲骨的发现、研究及其学术价值 王宇信 96
金文的发现与先秦史研究 杜运松 101

{ 青 }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原因 四川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 年 } 战国时期的尚贤政治与百家争鸣 卢 丁 105
{ 园 } 先秦的“士”与百家争鸣 雒三桂 107
{ 地 } 学术自由是百家争鸣的前提条件 韩石萍 109

• 文史信箱 • 为什么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王玉哲 111

• 文史古迹 • 虎丘·馆娃宫 蒋 康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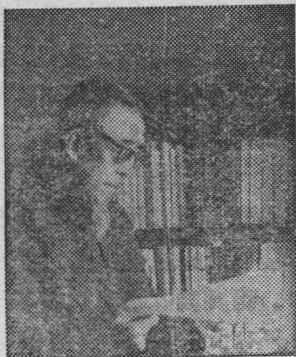
• 文史研究动态 • 夏文化探讨的回顾与展望 朱绍侯 孙英民 121

编 后 128

补白 6 则 商朝的武器和刑罚(18) 秦以前各代的都城(53) 太祝·
太宗·卜正·太史(64) 楚之霸,樊姬之力也(87) 西
周与东周(100) 齐桓公好服紫(115)

半坡出土陶器上的彩文(封二) 虎丘(封三)

封面设计 王增寅



先秦史研究的 现状和展望

赵光贤

赵光贤 1910年生，193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1938年入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从陈垣先生学史学，1940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留校执教世界史，后改教先秦史。1952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仍教先秦史，直至于今，现为博士导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主要著作有《周代社会辨析》、《左传编撰考》及论文数十篇。

范围 由于中国古代史的时期太长，通常为了研究和教学的方便，把它划分几个阶段，从远古到秦帝国成立以前算是第一个阶段，名为先秦史。这种阶段的划分，不是以社会性质来分的，而是按朝代来分的。秦以前有夏、商、周三代，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大帝国，与三代比较，前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变化比较大，因而习惯上把秦帝国建立以前划分为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个阶段。

先秦史从何时开始？从名称来看，应从几十万年前的猿人开始，但是这段历史时期仍然太长，而且旧石器时代是古人类学者的研究范围，只有古人类学家才具有研究这个时代历史的知识。旧石器时代以后是新石器时代，时间近得多了，这时仍没有文字，或只有图画式的文字，这是考古学家研究的园地。这两个石器时代都在有文字记载以前，西方学者给它起一个名称，叫做“史前史”，意即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主要是考古学家的活动范围。

过去我国的先秦史是从有文字记载开始的。司马迁作《史记》从黄帝开始，从黄帝到尧舜都属于传说时代，因古书上已有关于他们的记载，所以我们研究先秦史也可以从他们开始。这个传说时代很可能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所以研究先秦史的人也有人研究新石器时代和古史传说的。

先秦史的重点是夏、商、周三代，尤其是商、周二代。有关夏代的文字记载不多，而地下考古发掘至今还未将真正的夏代实物发掘出来，目前还在探索中，因而可用的资料很少。商周两代除有比较多的文字记录外，还有大量甲骨文和金文出土，还有大量的实物如铜器等，为研究商周二代的历史提供丰富的材料。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考古学家用科学方法发掘出越来越多的地下实物，甲骨文和金文成为专门的古文字学，为历史研究提供方便条件。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先秦史的研究，考古学家是站在第一线的，古文字学家和古器物学家是站在第二线的，历史学家是站在第三线的。当然这三条战线的划分不是绝对的，一个人可以同时在这两条战线上工作，读者请勿以辞害意。

现状 关于先秦史的研究的现状，我想只谈谈近几十年来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的研究，这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已经由几位老前辈的历史学家如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人开始。他们都成为古人，其开创之功是不可没的。现在从事先秦史研究的人大都是继承他们的成就而加以发展的。关于原始社会的研究，由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不断发现，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进步。关于夏代史，目前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山西作了一些发掘工作，探索所谓夏文化，取得一些成绩，不过问题还不少，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仍有待于今后的不断努力。

目前先秦史的研究重点在商周两代，关于商代史，主要集中在甲骨文的研究和发掘。首先是把散布到全世界的甲骨收集起来，四万余片编成一书，这是在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胡厚宣同志主持下编辑成的，名为《甲骨文合集》，释文即将继之出版。在发掘方面，考古所同志们于1973年在安阳小屯南地发掘出四千余片甲骨，编成《小屯南

地甲骨》一书（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殷代甲骨文方面最重要的新收获。

关于商代考古方面的收获非常丰富，主要有一、商代前期都城的发现，有两个城址，其一在河南偃师县尸乡沟，另一在今郑州市，前者有宫殿遗址，当是都城所在地，后者有城墙遗址，虽大部分被埋在地下，但从露出地面上的来看是与二里冈文化同时期的。从古书记载，我们知道从汤至盘庚曾五次迁都，但除了在安阳小屯发现殷墟外，以前的四个都城皆不知所在。五十年代初发现了郑州的商城，七十年代又发现了偃师的商城。这两城究竟是哪个商王的都城还有争论，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二、建国以来三十多年中，小屯殷墟的发掘工作一直在进行，收获很大，除了上述大批甲骨文出土外，还发现了武官村大墓（1950）和妇好墓（1976）。武官村大墓虽早已被盗掘焚烧，残留的器物不多，但从其规模形制之大与残存陪葬器物和殉葬人数之多来看，肯定死者是殷王或后，非一般贵族。至于妇好墓的规模虽较小，但陪葬器物特别丰富而精美，而且铜器大都有作器者名，而以妇好为最多，因此墓主当是常见于甲骨文中的武丁之后妇好，这样就给商代历史提供实物证据。墓中铜器、玉器多而且精，为我国古代工艺美术史增加宝贵的资料。

此外应当指出，由于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商代文化遗址大大扩大，向北则河北省的邢台、藁城等许多地方都发现商代遗址，甚至远至辽宁省的喀左旗，发现了所谓红山文化，因而近来商族起源于东北说又盛行起来，他们认为红山文化是商族先世所创造，然后逐渐进入中原，建立商朝。这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往南在湖北黄陂盘龙城，不仅发现了商代遗址和墓葬而且有宫殿遗址。甚至在长江以南的江西清江县也发现了商代文化遗址和铜器石器等，而且文化堆积相当厚，还有湖南宁乡发现一些窖藏，出土大量商代铜器。往西，陕西城固最近发现大量商代铜器。这样就提出了问题，商人建立的国家会有这样大吗？当然不会，从历史上看，以上这些遗址都远离商都中心地带，这些地方应是其它民族所居之地，只有河北一带距中原较近，有可能是

商人的势力范围。但中原以外地区已完全接受商人文化，出土器物足以证明。从古代文明史的角度来看，这说明商文化确是当时中原文化的代表，黄河流域不仅在政治史上，而且在文化史上无疑是中华民族的生长发展的中心。

关于商代社会与历史的研究，自从郭沫若同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很多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在社会性质、经济情况、典章制度等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研究，进步是很大的。除散见于各杂志、学报上的论文外，专书有《甲骨探史录》、《甲骨文与殷商史》等，但这些研究仍还是初步的，还有待于深入的探索。这些研究大部分以甲骨文为主要材料，而甲骨文本身有它的局限性：一是文字难认，特别是人名、地名等与后世文字联接不上，所以目前研究商史的学者至少一部分精力仍须用在文字考释上。二是甲骨文因龟甲易碎，因此出土的绝大部分是碎片，读起来很困难，因此在利用甲骨文材料之前，必须作些缀合工作，把零碎的片合成一整片，这样研读起来就方便多了。但是这个缀合工作也不是容易作的，大部分碎片是缀合不起来的。三、由于甲骨文有很多后世不见的字，不仅解释不一，理解也往往分歧，出入很大。四、还有一个带根本性的局限，就是甲骨文都是殷王室的卜辞，这与一般人民的生活关系很少。能不能用王室的卜辞来研究整个殷代社会？恐怕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五、最后还有一个大问题，截至目前为止，甲骨文都是从殷墟出土的，那么商代前期怎么办呢？能不能用殷代甲骨文所认识的殷代社会来代表整个商代呢？这问题都是很难解决的。

下面我们谈谈周代历史的研究。研究周代历史比较容易多了。一个原因是文献材料比较丰富，《尚书》中的《周书》各篇大多数是周初的官方文件，《诗经》的雅颂也可以看作西周的信史，其它古书讲东周的历史，如《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等就更多了。另一个原因是陕西、河南近百年来有大量铜器出土，多长篇铭文，少者数十字，多者数百字，给我们提供大量历史材料，尤其是解放以后，以陕西岐山、扶风二县即以周原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出土铜器最多，而且富有历史价值。例如武王时的“利簋”记载着武王克商的记日干支确实在甲子，与

古史吻合，而且有岁星出现，与《国语》所说“岁在鹑火”之说合。成王五年的“何尊”记载着武王营建洛邑的遗志，与《逸周书·度邑》合，成王迁居洛邑，则为史书所未载。又在解放后出土于洛阳的“令彝”对周初史事、官制等关系甚大。恭王时期的“卫盂”、“五年卫鼎”，记西周贵族间有土地交易事，对西周经济史关系甚大。又“猷匜”记诉讼判案事，为西周刑法史的好材料，可补《尚书·吕刑》之缺。“永盂”记周王锡田事，可与“克鼎”相比。此时最有意义的器物是《墙盘》，盘铭前半歌颂武、成、康、昭、穆五王的功德，后半记微氏家族自高祖、烈祖、亚祖、文考乙公至史墙五代的史实，说明武王灭商以后，“微史刺祖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寓于周”，表明墙的曾祖原系微国史臣，降于武王，以后可能世为史官，故自称史墙。此外若“柞钟”记中大师令柞“司五邑倮人事”，有关土地劳动者的身分，“戡簋”、“多友鼎”记伐北戎严允事，“禹鼎”记伐南淮夷事，都有补史事研究。此外尚多，不胜枚举。这些新出金文记事往往有出于旧器之外的，大有裨于西周史事的研究。

西周甲骨文的发现是西周考古工作中一大创获，出土地点不只一处，而以1977年在岐山县凤雏村所发现289片带字甲骨为最重要。这些甲骨的特点是字特小，刻法凌乱而粗糙，远不如殷墟出土的整齐优美，说明殷文化虽传到周原，但还在原始阶段。这些甲骨文字涉及文王时期的殷周关系，如记殷王封昌为西方伯，与“史记”符合。还有，如六个数字的排列亦见于金文，研究者认为这是八卦的起源，是很值得注意的研究课题。

考古工作者对历史研究的贡献还有很多，例如在陕西千阳、陇县发现矢国遗址，证明了矢国与散国都在渭水之北，纠正了过去所说的在渭水之南的错误。武功郑家坡先周遗址的发现为周族及其早期文化的起源，以及周族与姜族的关系等问题提供新的资料。河北涿县周初墓葬的发掘与“董鼎”的出土证实了召公奭的封国确实在燕，而不在有人说的河南偃城，说明周初封国有的确实很远。江苏丹徒西周墓出土的《虞侯矢簋》，记载着虞侯受封远在江南，而且有锡土田人民的明文，与召公封燕有同样的政治意义与历史意义。

关于金文著录自宋代即有专书，至清代而益盛，但编辑多不得其法。自郭沫若同志编辑《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考释》，开始按年代排列，这才上了历史研究的轨道，而且图录与考释并重，这可帮助读者作年代学的鉴定，为后之研究金文者开一新途径。建国以来新出土的金文著录成书的有四川大学历史系编辑的《殷周金文集成》，甚便于参考。又社科院考古所正在编辑一部金文全书，定名《殷周金文集成》，将出十册，将古今所见金文皆包罗在内，这对于殷周历史研究是非常有用的书。

由于西周金文的大量出土，不少学者都竞相作文字考释，断代研究与史事考证，取得很可观的成绩。对比之下，在古史籍研究方面就显得相当寂寞。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在《尚书》研究中作了不懈的努力，成绩比较突出。顾先生是《尚书》专家，以高年仍从事《尚书》研究，发表了好几篇关于《尚书》和《逸周书》的校勘、注释和评论，真是难能可贵，足为后学楷模。

关于东周列国的器物，我只举几件最著名的发现：一为在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共65件，其中有楚王熊章，即惠王赠送的一个钟，铭文记着楚王五十又六祀，当公元前432年，已入战国时期。金文中有国名王名又有纪年的极为罕见。这一套编钟，制作精美，文字秀丽，是古代音乐史上的绝好材料。特别值得赞美的是它的铸造技术的高超，至今击之仍可奏优美动听的乐歌，真希世之宝。这对我国古代音乐史、美术工艺史都有绝大贡献。墓中还有竹简六千多支，记载着墓中葬品，为研究战国文字的好材料。

河北平山县的中山王墓的发掘对研究中山国的历史有重大贡献。出土有铁足中山王鼎、方壶、圆壶三器，有长篇铭文，追述了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伐燕，中山也参加了，这是以前未见记载的。从铭文中我们还得知中山王的世系有文、武、桓、成诸王和作器者王𪔐和嗣子𪔐六世，还有当权的相国司马𪔐，为中山王国的历史补充好多史料。中山原系鲜虞族所建国家，相传姬姓，并非周族。从出土的器物、文字看来，当时北方的狄族几乎完全华夏化，多少还保留一些北方民族的风格。另外铜器的制作也极为精美，鼎、壶上的文字不是铸造的，

而是用银丝镶嵌上去的。其它铜器也多用金银镶嵌花纹，非常美观，从民族史的角度来看，中山王墓的发现更具重大意义。

另外与春秋史有关系的发现是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的盟书。春秋时期各国诸侯之间，诸侯与卿大夫之间经常有盟誓，名为载书，侯马盟书象是春秋末期晋国的赵氏家族内部的盟书，都是用朱笔写在圭形的玉石片上。盟主是赵氏，有的名嘉，也有作“子赵孟”的。盟书大意是盟主和同盟者之间的誓约，共同讨伐敌人。被讨伐的有“赵尼及其子孙”，还有先氏等。盟书中两次提“中行寅”，即荀寅，所以这盟书很可能反映了赵鞅与荀寅、范吉射之间的斗争的历史事实。这批盟书已编为《侯马盟书》出版，可供参考。

此外，全国各地几乎都有重要城址、墓葬的发现，如洛阳王城、陕县虢太子墓、齐国的临淄城、江陵、长沙、信阳、浙川各地楚墓、寿春蔡墓、陕西凤翔秦墓等，都对历史研究有所帮助；限于篇幅，只得从略。

中心问题 由于新史料的不断出现，特别是由于党的三中全会以后，重新提出双百方针，先秦史的研究和其它阶段一样，呈现出一片活跃繁荣的景象，报刊杂志发表的论文非常多，而且出版了几部专著。这些论著，从史事的论证到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方面都进行了探讨，问题非常多，百家争鸣，论辩也很热烈。不过其中有一个主导的或中心问题，就是分期问题，也就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线定在什么时期的问题。为什么说它是主导的或中心的问题？因为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和它分不开的，许多文章的立论都是在分期问题上的一个前提下写的。有人因为自己对这个问题下不了结论，想避而不谈，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从五十年代就存在的老问题，到今天依然存在，但是我觉得随着时代的进步，大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史实的结合逐渐深入，这个问题早晚是能解决的。

古史分期的说法很多，除了个别人或很少数人的提法外，主要有三派：一派是战国封建说，即把分界线定在春秋、战国之际，这是现今流行的说法；一派是西周封建说，即把分界线定在殷周之间；一派是魏晋封建说，即把分界线定在汉末。这三派都有一定的力量，成鼎足之

势。应当指出，还有一派也不可忽视，就是中国无奴隶社会说。这派在五十年代就出现，但由于受到批判，被打下去，现在又复活了，不仅复活了，而且主张这种说法的人数好象越来越多，因此在古史分期上，这派也应占一席地位。在以上各派中，第一派是当今流行的，大学中学的历史课本，历史所、考古所的著作多半都是属于这派的，不过近时受到越来越多的其它派的挑战。我们以为百家争鸣比定于一尊要好，这是可喜的现象。

展望 近年来先秦史的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一、成立了中国先秦史学会，已经开过两次预备会，两次大会，每次大会都收到论文一百多篇，并进行分组讨论，不同意见得到交流和切磋；二、此外还有专题讨论会，如在历史所领导下1984年在安阳召开的商史讨论会；1983年由四个团体在宝鸡、洛阳联合召开的西周史讨论会，都有论文集出版。在古文字学方面有古文字学讨论会，已出版几集专刊。在先秦诸子研究方面，有曲阜师大的孔子研究所，近来且扩大为全国性的研究会，已出版几册论文集。三、过去没有深入研究的领域，近来发展为地区性的讨论会如楚文化讨论会，还有齐鲁古国历史的讨论会，吴越文化的讨论会等，这些研究活动对推动先秦史的研究都起到很好的作用。四、大批中青年研究人员和教师已经起来，他们在先秦史研究方面越来越起到骨干作用。

总之，近年来先秦史研究的成績是巨大的，但也存在着问题：一、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史实的结合上往往出现教条主义的毛病，二、在史料运用上，有些人不管史料的年代和真伪，就拿来用作自己立论的根据，如有人用伪古文《尚书》来说明在古代已实行民主政治或认作“仁学”的来源；有人根据战国时代的《夏小正》来论证夏代制度；有人根据西汉儒家编的“三礼”来论证西周的礼制，诸如此类，不免牵强附会。针对这后者情况，我愿建议大家，特别是青年朋友认真读读《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我们都知道研究历史要去伪存真，但必先去伪才能存真，有些伪书伪史前人已经弄清楚了，我们不知，还在沿讹踵谬，大写文章，岂不是犯了南辕北辙的毛病吗？

“风”、“骚”传统 对后世文学形式的影响

杨 公 骥

马克思谈到物质生产时说过：任何生产力都是人们实践能力的结果，是世代相传的。“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选集》四卷三二一页）这真是至理名言。试想，人们如果不能把北京猿人使用火的技能继承下来，怎么会有现代文明？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不例外。“继承文化遗产”并不仅是一种主张，实乃历史发展之必然。即以文学而论，每一代的文学都是继承着前代的遗产（包括艺术手法、技巧、形式等）并基于现实的社会生活而发展起来的。

我国古代学者早就发现文学传统的继承性。例如，沈约（441—513）在其《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写道：“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司马）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曹植）仲宣（王粲）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飘流所始，莫不同祖风（指《诗经》）、骚（指《楚辞》）。”这意思是：自汉代以来的辞赋诗歌，虽然文体各自不同，风格不断变化，但都是源于《诗经》和《楚辞》，都是对先秦文学传统的继承。这一评价是客观中肯的。纵观中国文学史，可以发现，“风”“骚”传统在后代诗歌中不断地被继承、发扬、光大，影响所及，前后几千年。这种影响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容风格方面，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传统，赋、比、兴的表现手法等即是；一个是艺术形式的方面，本文着重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被汉代儒尊为“经”的《诗经》，是古诗选集。它虽结集于周代，但并不全是周代诗。其中有些是由于礼俗、祭祀或其他原因而被保存下来的原始氏族社会时代的诗歌（如《载芣》、《良耜》、《生民》、《公刘》等）。

就文体特征而言，诗歌是有节奏有韵律的语言加强形式。这一点，即使在原始诗歌中，就已经相当明显。

节奏是诗的主要特征。诗之所以有节奏是因为它是由劳动时的呼声演变而来；劳动呼声之所以有节奏则是伴随劳动动作节奏而形成的。一般劳动的动作是由一来一往两个行动合成：打夯动作是一举一落，伐木动作是一斫一扬，拉锯动作是一进一退。这样，正如今日步兵行进时唱歌，其歌声的节拍必须适应步伐的节拍一样，原始劳动诗歌也必须配合由两个行动合成的劳动动作，从而形成由两个节拍合成的四言诗句，如：“伐木/丁丁，鸟鸣/嚶嚶”。（《诗经·小雅·伐木》）

诗之所以有韵脚，最初是由于对劳动动作音响的配合（谐应）。劳动动作一般是由一轻一重两个行动组成。以打制石器为例，举锤时用力轻而无声，下击时用力重而有音响：音响发生于第二行动之尾，也就是劳动动作节奏的二拍子之尾。所以，与此相应，最初劳动诗大多是在二节拍（四言）之尾“押韵”。姑以《诗经·召南·小星》为例：“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当然，不同的劳动动作有不同的音响，所以在古代诗歌中曾出现过“头韵”和“腰韵”。但作为传统被后世继承的却是押尾韵（句末押韵）。

诗的语言之所以被加强（美化），最初是被诗的节奏形式所促成的。在劳动中，当人们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用诗的样式歌唱出来时，就必须使自己的语言适应诗歌的（也即劳动动作的）节奏。这样，人们便必须从杂乱的思想中提取出主要部分，必须从罗唆的语言中提炼出准确生动的语词，以适应节奏，以便于歌唱。二拍子（四言）节奏比较短促，它要求句子简洁，语言明确。由此，“修词炼字”和洗练语言便逐渐成为人们有意识的行为。这就提高了人们的思维能力。可见，正是由于诗节奏对语言的“量”有所限制，才提高了诗句语言的“质”。譬如《诗经·周南·关雎》首句“关关雎鸠”，“关关”是表鸟鸣叫的声音。

如将本句诗意“详言之”，便是：耳朵听到“关关”的鸟声。是“雎鸠”在啼叫。次句“在河之洲”，“在……洲”是表鸟所处的方位。如将本句诗意“详言之”，便是：顺着鸟声，用眼睛四下寻觅，才看出雎鸠是“在河之洲”用叫声召唤“情侣”。为了适应诗的二拍节奏，《关雎》诗作者便不得不减去这些可有可无的语言，经过高度浓缩，便把上述意思“精简”成二句四言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就构成了诗的含蓄。由此可知，诗的节奏对语言起着“提纯”的作用，这就是删繁趋简，去芜存精。艺术重在剪裁，而节奏则促使了诗歌语言的加工，形成了诗歌语言的艺术美。

《诗经》是最早的诗歌选集，它显然继承了原始时代的诗样式，并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得到新的发展，从而使二节拍四言诗的样式日益完善。因此，《诗经》为后代的诗歌创作奠定下坚固的基石。秦汉以后的诗歌在句法、章法、节奏、韵律、对仗方法、语言技巧和形象构思、形象表现等各方面所呈现的民族特点，如考其滥觞，无一不是起于《诗经》。

在章法样式上，《诗经》诗基本是以四句（或四的倍数）为一章。这在三百篇中占绝大多数。所以如此，其原因之一可能是受到生活逻辑（或逻辑观念）的影响。通过社会生活实践，当时人们发现一般事件在运动过程中大多呈现为“发生（起）、发展（承）、转变（转）、结局（合）”四个阶段。因此，在表述思想或反映事件时往往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起、承、转、结”这一格式。《诗经》中有些诗便体现着这一顺序。仍用《关雎》诗为例。首句（起句）“关关雎鸠”，是由听觉感受“起”（起头），说明听到雎鸠叫春；次句（承句）“在河之洲”，是用视觉感受“承”接上文，点明看到叫春的雎鸠正在河之洲觅偶；第三句（转折句）“窈窕淑女”，是由触景“转”生情，由鸟叫春觅偶联想到人自身；第四句（结句）“君子好逑”，是从思念中得出“结”语，表现了作者的愿望：只有她才是“君子”的好配偶。《诗经》中用这种章法形式的并不少，如《静女》、《伯兮》、《木瓜》、《子衿》等等。这种诗歌的章法样式曾对后世起着深广的影响。用所谓“盛唐”诗为例，如王维《相思》：“红豆生南国（起），春来发几枝（承）；劝君多采撷（转），此物最相思（结）。”又如

杜甫《宿府》：“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起）。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承）。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转）。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结）。”以后，元明时的诗人杨载、范梈、周履靖、冯舒等总结历代诗歌创作经验时，提出“律诗要法”是“起、承、转、合”：起句“要突兀高远，如狂风卷浪，势欲滔天”；承句“要如骊龙之珠，抱而不脱”；转句要“就题转意，因转更深”，“要变化如疾雷破山，观者惊愕”；结句要“涵蓄不尽，意重语轻”，“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创作论是否对，姑且不论，但从中可以窥见《诗经》章法特征的影响。事实是它不仅影响着后世的诗作，而且间接影响了元戏曲的结构形式。在元杂剧中每一剧本分为“四折”。第一折是“起”，演故事情节的发生；第二折是“承”，演情节的发展；第三折是“转”，演情节的变化转折，剧的“高潮”一般是放在本折；第四折是“结”，演故事的结局，“大团圆”。明代的八股文尤其讲究“起、承、转、结”，把它看作是必须遵循的章法。如果说，用“起、承、转、结”四段法来安排诗、文、戏剧的结构乃是我国文学的民族特点，那么，若寻起“根”来，便不难发现它是起源于《诗经》。

在句法上，《诗经》诗基本上是二节拍四言诗，《楚辞》基本上是六言诗。如不将“兮”（呼声）计算在内，“楚辞”句法有四言、五言、六言之分。虽然如此，但基本上仍是使用二节拍样式。四言如“秋兰兮/麝芜，罗生兮/堂下。”（《九歌·少司命》）五言如“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九歌·湘夫人》）六言如“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离骚》）六言是“楚辞”的基本句式。

《诗经》的四言句法和《楚辞》的六言句法曾对后代出现的文学体裁起过重要影响。汉代新兴的“赋”，以文体而论乃是一种散文诗形式。它的出现意味着文学的发展和提高。在句法和章法上，赋继承了“诗”“骚”传统，交互使用四言和六言句式，将两者混合成为赋的主要句法。例如：“弭节徘徊，翱翔往来，睨部曲之进退，览将帅之变态。”（司马相如《子虚赋》）又如：“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班固《西都赋》）魏晋以后，从赋体中

又孳生出一种新的文体：四言、六言交替使用，偶句排比，互为对仗，名为“骈文”（骈俪文）。由于“骈四俪六”，唐宋人又称为“四六文”。这文体曾受到刘勰的称道：“若夫笔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文心雕龙·章句》）他的巨著《文心雕龙》便是使用诗、骚混合句式（四六骈俪体）写成的。骈文自魏晋至隋唐盛行了五百多年，成为“文之正宗”。被赞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虽然提倡“古文”（散文）反对骈俪文，但骈体文并未因此而消歇，制、诰、表、启、章、奏和箴、铭、赞、颂、记、序等文依然使用骈体。而作为“古文大家”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也都是写“四六文”的大手笔。直到本世纪民国时代，衙门的告示，官僚的寿文，军阀的通电仍是用对仗工整的骈体文。骈文不只通行于历代官府中，在唐代以后的通俗文学、传奇、小说、戏剧中都能看到它的强烈影响。唐代张鷟的《游仙窟》通篇使用骈俪文体，如写崔十娘的容貌：“千娇百媚，造次无可比方，弱体轻身，谈之不能尽备……”，“才舒两颊，熟疑地上无华（花），乍出双眉，渐觉天边失月……”；写别后思念：“千思竞起，百虑交侵，独嘶眉而永结，空抱膝而长吟，望神仙兮不可见，普天地兮知余心。”作为传统，在明代文言小说如《钟情丽集》、《天缘奇遇》、《三妙传》中也夹杂着四六文句子。清代陈球的《燕山外史》全书是用四六骈体写成。至于宋人的通俗小说，虽通篇使用口语（白话），但每当描绘景色或形容人物时，则往往使用四六骈文。仅举《志诚张主管》为例，如：“当日天色已晚，只见：野烟四合，宿鸟归林，佳人秉烛归房，路上行人投店……”；又：“这小夫人……生得：新月笼眉，春桃拂脸，意态幽花殊丽，肌肤嫩玉生香……”。在白话文的叙述中夹有四六文的描写，已成为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格式，在《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长篇小说中也都常见到。不仅小说中如此，在宋元以后的“戏文”中也常用四六文作对白。仅以《琵琶记》为例：“旦：‘官人！云情雨意，（虽）可抛两月（之）夫妻，雪鬓霜鬟，（竟）不念八旬（之）父母；功名之念一起，甘旨之心顿忘，是何道理？’生：‘娘子！膝下远离，岂无眷恋之意，（奈）堂上力勉，不听分割之词。咳！叫卑人如何是好？’”（南浦嘱别）由此可知，在汉赋、六朝骈文、唐人传奇、

宋人话本、明清小说和戏文等不同的文学体裁中都习惯于将四言句和六言句交织成章。显然这并非偶然，它是我国文学的民族形式特点的表现。如追溯其起源，便不难发现这正是直接或间接对《诗经》四言诗和《楚辞》六言诗的句式的继承和发展。

在诗的节奏上，如上文所说，《诗经》、《楚辞》基本是二节拍诗，但值得注意的是已开始出现三节拍的诗句。《诗经》中已开始出现三节拍的五言诗句，如：“谁谓/鼠/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召南·行露》）；“无以/我公/归兮，无使/我心/悲兮。”（《幽·九罍》）同样，《楚辞》中也出现三节奏的七言诗句，如：“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离骚》）“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九章·涉江》）如寻旁证，在春秋末、战国初的文献中可以找到不少三节奏的五言和七言句。五言有：“文绣被台榭，菽粟食鳧雁”（《晏子春秋》卷七），“骏马养外厩，美人充下陈”（《战国策·齐策》），“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孟子》引《孺子歌》）。七言如：“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左传·襄三十年》）；“禹劳/心力/尧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荀子·成相篇》）。

由以上可以看出，先秦时代已出现三节拍的五、七言诗句或诗。虽然它只是五言诗或七言诗的雏形，体制上尚不完整，但作为传统它对后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从诗歌发展历程看，它对此后二千多年的诗歌的句法和节奏具有开端意义。

有的学者不承认西汉时代有五言诗歌，认为汉成帝（公元前32—公元前8）之后才有五言歌谣，至东汉时代，班固（32—92）始为五言诗。对此，刘勰认为：虽然西汉“辞人遗翰，莫见五言”，只是说没有见到西汉文人作的五言诗，如着眼于民间歌诗谣曲，“则五言久矣！”（《文心雕龙·明诗》）这意见很对。别的不说，单《淮南子》一书，就保留着一些二节拍五言诗的样式。仅举二例：“孔子/辞/廪丘，终不/盗/刀钩，许由/让/天子，终不/利/封侯”（汜论训）；“骏马/以抑/死，直士/以正/穷，贤者/摈于/朝，美女/摈于/宫”（说林训）。显然，这是为了美化文章而利用了民歌的形式。从句法节奏说，前四句犹如《行露》是